



勵耘書屋問學記

史學家陳垣的治學

K825.8/9

勵耘書屋問學記

史學家陳垣的治學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封面设计：王师颀

励耘书屋问学记

史学家陈垣的治学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印张 163,000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500

书号 7002·26 定价 0.78 元



陈垣

(一八八〇年——一九七一年)



陈垣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学合影

(一九六二年)

廿味年來薄似紗
誰令騎馬客京華
小樓一夜聽春雨
深巷明朝賣杏花
矮紙斜行閒作草
晴窗細乳戲分茶
素衣莫起風塵歎
猶及清明可到家

通鑑公事屬書

陳垣

附錄一篇已托 晚兄轉呈 考證文最志
以明白令人易於誤會又悉書可省
省一字以同於此二點希

兩兄為我盡力挑剔 俾得改定 且以為感
專誌呈頌

晚峰 兩兄 甚妥 陳垣謹上 亥

文中所石甚多 殊為滿意 清

細為鑒勘 謹陳 以便洗刷 磨

疏 且盼

目 录

要继承这份遗产（代序）

——纪念陈援庵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白寿彝 一

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蔡尚思 八

陈垣先生的学识……………柴德赓 二六

援庵先生治史的方向……………郭预衡 五

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先师的史学……………牟润孙 六六

励耘书屋问学札记……………史树青 七七

励耘书屋问学回忆……………牟润孙 八四

——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 九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九二

——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 九二

励耘书屋受业偶记	李 瑚 二三
『书屋而今号励耘』	
——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	刘乃和 二三
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	赵光贤 一五五
学而不厌 海人不倦	
——向陈垣老师学习	刘乃和 一六三
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	刘乃和 一七七

要继承这份遗产（代序）

白寿彝

——纪念陈援庵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陈援庵先生，名垣，一八八〇年出生于广东新会，一九七一年六月因病逝世于北京，终年九十一岁。他早年曾在小学、中学教书，办过《时事画报》和《震旦日报》，学过医，创办过光华医学院和平民中学。后来，他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并任辅仁大学校长，又先后做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故宫图书馆馆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北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解放后，他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又连续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一年，他参加西南地区土地改革工作团，任总团长。一九五九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援庵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七十余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旧社会教育事业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把教育祖国后一代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他在教学上严肃认真，循循善诱，善于启迪学生以治学门径，鼓励他们在扎实的根底上用功夫。他任辅仁大学校长二十五年，从未中断课堂教学工作。新中国建立以后，他更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认为，办好高师是培养教育工作者和开展全国各级教育的重要环节。他年事日高，但还每年写文章鼓励新生树立雄心大志，为教育事业献

身,有时还到历史系听课,还给历史系学生讲治学经验。数十年来,他教育过的学生遍于国内各地,其中不少人已成为专家和教学骨干。

援庵先生在史学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差不多以毕生岁月从事研究工作。他写的史学著作,有十几种,论文有一百几十篇,他对于中国宗教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基础。

援庵先生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是广泛的。对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流传及其盛衰都有专门的论述。对于道教也写有专书。他所著《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基督教入华史略》和《基督教入华史》,是中国历史学家对这些宗教第一次系统的论述。他对伊斯兰教,虽只留下来《回回教入中国史略》这一篇演讲词,但他编纂中国回教志的设想,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对于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援庵先生对历史文献学的建基工作,包含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几个方面。他认为目录学是治史的门径。他为了掌握中国历史文献的概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亲自查对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编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目考异》、《〈四库全书〉纂修始末》、《四库书名录》、《四库撰人录》等。他所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论述了有关佛教的重要史籍,也论述了这些史籍对一般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这是在目录学方面有创造性

的一部著作。

关于时间的记载，是历史记载必要的构成部分，年代学的研究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以中、西纪元之差异而论，近代学者往往以中历的某年当西历的某年。实际上，这只能说是大约的对算。中、西的纪年，在一年之中往往可以相差二十几天到五十几天，如果不进行细致的计算，则在年尾、年首的史事纪年会误差一年之多。秦及汉初的纪年，都是以十月为岁首，这同西历纪年的差异就更大了。阿拉伯史书所用赫吉拉历是太阴历，即所谓回历，和中国旧历对算，每经三十年积差一年，一千年要差三十多年。如不了解这三种历法的差异，则在历史记载的运用上，必然会出现很多错误。援庵先生所著《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为这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换算工具，为中外史料的运用在纪年方面开辟了方便的途径。年代学的工作，在援庵先生的史学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上他的重要著作，如《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等，都以善于利用年代学的方法，排难解纷，获得新解。

我国自周以来的二千多年间，有避讳的习惯。因此，人们在阅读古书时就增加了一种困难。援庵先生认为，如果能了解避讳的情况，反而可以帮助读者解释古文书中的疑难，辨别古文书中的真伪和时代，辨别刊本的时代。因为各个朝代所避讳的字不一样，正可利用它们作为辨别时代的标志。宋、清的学者对避讳都有专论。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用避讳解释疑难的地方很多。但前人都没有对避讳有系统的论著。援庵先生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并加以发展，写成了《史讳举例》

这样的专书，为历史文献学作出又一贡献。

历史文献因传抄刊刻，难免有错误的地方。如不能发现错误，就不免对文献原意有所误解。我国历史家对文献校勘的注意，由来已久。清代学者校勘之风大盛。援庵先生很注意校勘问题。他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他以《元典章》的校勘为范例，用五种本子同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勘，发现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妄改的地方一万二千余条，他据以写成校补札记六卷，补缺文三卷，改作表格一卷。他又在一万二千多条中选出十分之一，加以分类和说明，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共五十例。这部书不只举出了行款字句之误的通例，还举出了因不懂元代用字、用语和名物而致误的特例。这就说明了校勘工作不只是文字异同的简单对勘，而且要对有关历史知识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了解。这书的最后一卷还举出了八条校例，其中包含校勘方法，指出了校勘工作的入门途径。这本书后来改称为《校勘学释例》，是我国校勘学史上带总结性的著作。

在援庵先生前期著作中，他比较重视《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此书是讲国内西方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的汉化的。它的规模宏大，材料丰富，条理明辨，是在国内外久享盛誉的著作；对于治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者说，是一部必须阅读的书。

一九三七年北平沦陷后，援庵先生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鉴胡注表微》。他在这里流露了深沉的爱国思想。这时候，援庵先生的史学思想显然进入

了新的意境。他探讨了两宋之际和明清之际佛道两教在宗教活动背后的政治环境，探讨了民族斗争在宗教内部宗派斗争上的反映。这种作法是他过去的作品中所没有的。他在家书中说，「三十年来所著书，以此书（按指《佛教考》）为得左右逢源之乐。」这表达了一个辛勤的学者在进入新意境时开朗的心情。《表微》二十篇代表了援庵先生后期著作中的丰满的成就。他自称「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实，无论是言史法或言史事，都要对《胡注》进行「隐藏在文字里的思想的探索」，而且这种探索总是结合着《胡注》的议论和所表述的史事而发挥援庵先生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吸取历史经验以观察世情，特别是观察面临的变局并讲求作人处世的正确道路，这本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援庵先生在著述上和实践上都继承了这个传统，把他的史学成就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也为解放后他热心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七十九岁高龄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思想基础。

援庵先生的史学，以历史考据方面最有成就。无论是宗教史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论著，都是考据的成果。他的考据工作，有独到的特点。第一，他研究一个问题，总尽可能广泛地搜集材料，严于取舍。二万多字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是由三尺多厚的稿本中提炼而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只用了原来收集的材料中的一千多条，而不用者竟有一万多条。第二，他于复杂的现象中，注重寻求类例，使读者获得有条理的了解，并可以从而有举一反三的效果。所以《元典章校补释例》也可以称作《校勘学释例》。第三，他讲究著述体例。他所采用和开创的体

例，是丰富多样的。援庵先生的考据工作，是从学习钱大昕入手，但他的成就是远远超过钱大昕和乾隆嘉庆年间的考据家的。

援庵先生在著《表微》的时候，明白表示，不以考据自限。他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这正确地说出了考据在史学工作上的地位，但他在感情上仍然流露出对考据的偏爱。因此，《表微》在总的方面是一部因史论政之作，同时有好多篇幅却又是他总结考据经验之作。解放后，援庵先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治史的重要和必要，深切感到单纯的考据在历史研究上的不足。一九五〇年初，他给朋友写信，表示「一切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事」。后来，他自述治学进程是「钱、顾、全、毛」，表明他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经由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和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终于找到了毛泽东思想。他去世后，邵循正先生挽词，说：「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仇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这都描画出当年援庵先生不断要求进步的心情。尽管因年事已高，不能再象过去那样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在思想上这种深刻的变化，已为后来的学者指出史学工作必须遵循的更广阔的道路。

一九八〇年是援庵先生的百周年诞辰。我阅读了他的遗著，包括了大量我未曾读过的作品。我认为，接受援庵先生留下的这份遗产，对于改善我国目前史学界状况，特别是改善高等学校历史教学的状况，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一，我们历史工作者需要有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素养，高校历史系

的学生需要接受这方面的训练。我们应在援庵先生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努力把历史文献学健全起来。第二，援庵先生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即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的传统，仍旧是我们传播历史知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这个传统。第三，我们应该十分诚恳地向援庵先生学习，学习他那种不断要求进步的精神，学习他以高年而迫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我们在这方面的条件要比他好得多，要加倍努力去掌握这个理论武器。目前，有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这是非常错误的。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有历史文献学的素养，才能把史学工作做得更好。援庵先生在这方面的体会，是很深刻的，他已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最后，我愿意特别推荐《通鉴胡注表微》这部书，这是援庵先生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好好挖掘的东西，这是更可珍视的遗产。我们应当以继承他的史学工作和史学遗产来更好地纪念他。

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

蔡尚思

五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求学，陈垣先生是我最多接谈的导师之一。饮水思源，我是永久忘不了他的。他于一九七一年逝世，终年九十一岁，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很值得全国学术界的隆重纪念。我现在回忆往事，真是历历如昨。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来评价一个老专家，我觉得陈先生有下列几个特色：

一 专题深入的治学方法

陈师的治学方法，基本上是属于清代朴学的一个体系的，但在研究的范围和中心上，二者已经有所不同：他不再以经学小学为中心，曾说：『清代经生，囿于小学，疏于史事』（《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他颇相反，这是学问中心的不同。他比清代朴学家更加集中精力，专做『窄而深』的史学工作，不再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近自书本，远至器物调查，什么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艺等等无所不包。他曾亲对我说：『象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的所谓名著，很象报章杂志，盛行一时，不会传之永久。』直到一九三三年，还来书教导我道：『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以动国际而垂久远。』但在